

善與「俄」：俄烏戰爭中澤倫斯基 推文言說框架與戰爭傳播策略研究

江知萱

陸軍專科學校學員生指揮部政戰官

孫復威*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從框架理論與敘事分析出發，探討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基於官方推特（Twitter）公開推文的主題及其言說策略。資料蒐集時間為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 11 月 13 日，總計 447 則推文。經隱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簡稱 LDA）主題模型分析後發現，澤倫斯基推文的主題框架可分為：1. 人道主義迫害、2. 援助與抵制、3. 與烏克蘭同一陣線。進一步檢視其敘事架構後發現澤倫斯基在善惡歸納、道德評價和行動方案等面向，彰顯戰爭歸因與烏克蘭國家／人民價值，並且表達烏國訴求和利益，更藉由「口號」連結其目的與主題框架，進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關鍵字：社群媒體、俄烏戰爭、框架理論、敘事分析、隱含狄利克雷分布

* 通訊作者，E-mail: fuweisun5@gmail.com

投稿日期：2022 年 11 月 02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4 月 01 日

壹、緒論

隨著傳播科技的進步與網路的普及，現代戰爭型態亦隨之轉變，除了過往傳統熱戰外，也包括了認知戰、資訊戰等層面。其中最大的差別，即在於如何透過媒體與資訊的傳遞，說服目標受眾支持其軍事行動，達成戰略目標（方鵬程等人，2016）。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宣佈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以「去軍事化」及「去納粹化」等原因，闡述其受到烏克蘭軍隊威脅，並表示在收到頓內次克（Donetsk）及盧甘斯克（Lugansk）兩親俄地區領導人的請求後才開始以維和部隊名義派遣俄軍穿越邊境，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及多個城市發起攻擊（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022年2月24日）。此舉不僅代表著俄烏兩國在政治與軍事衝突對立的全面升級，亦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所爆發的最大規模戰爭。

隨著兩國戰爭的爆發，戰爭中的傳播現象同時成為關注焦點。在《戰爭傳播》（*War Communication*）一書中，國內學者方鵬程（2007）曾以「4CI」—Command（指揮）、Control（控制）、Communication（通訊）、Computer（電腦）、Intelligence（情報），以及宣傳戰與心理戰所處的「第二戰場」為基礎，提出戰爭傳播是以宣傳和說服為手段，目的在於爭取國內外的民意支持、輿論認同與行動參與，以期獲得友邦聯盟、打擊敵人民心士氣的政治行為。這也表示，衝突期間的媒體使用與訊息傳遞常是有計劃的策略展現，在面對戰爭威脅下，如何妥慎擬定並運用傳播策略便成為取得戰略優勢的重要一環。而這樣的資訊戰之所以特別，除了是專制與民主國家之間的較量外，更是從大眾媒體主導到社群媒體參與的一種轉變，從而影響了今日俄烏戰爭主流價值觀的形塑。

以往的戰爭衝突中，政府在傳播與相關資訊處理常處於被動，但烏克蘭這次面對俄軍的步步進逼卻積極地面對處理，務求對外、內能夠建立有效的溝通及傳播，除利用政府統一發佈重要資訊，也透過各種渠道呼籲民眾跟隨官方消息、快速回應各類謠言，以阻止虛假消息在民間散播。例如，有俄議長宣稱烏總統在戰事進行期間早已逃出基輔，而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及其幕僚則在當地知名歷史建築物前自拍，迅速上傳社交網路加以澄清與反擊（楊駿宗，2022年2月26日）。此外，烏克蘭在戰爭中充分利用社群媒體平臺——推特（Twitter）推文的快速傳散特性，做為軟實力的延伸，以框架及敘事手法有意圖、目的性的影響國際社會對於戰爭歸因及責任承擔

對象的看法，將烏克蘭的受苦形象配合人道主義救援，以「幫助烏克蘭」鏈結社會期許，甚至藉由標籤「#StandWithUkraine」、「#StopRussia」進行支持烏克蘭、阻止俄羅斯等行動，使得口號不再只是口號、標籤也不只是標籤，而是能連結人們及改變認知的重要關鍵。

身處戰事之中，面對巨大威脅的烏克蘭，如何憑藉推特取得網路話語權、爭取支持，使國際社會與烏克蘭站在譴責俄羅斯的同一陣線，其社群言說策略值得深思與探究。因此，本研究以烏克蘭國家領導人推特社群作為主要研究平臺，藉由框架與敘事之觀點，運用資料探勘方式蒐集與分析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中的推文架構，檢視其如何透過有意識的過濾、排除與強調所選擇的訊息以及推文內容研訂，爭取國際支持，形成對己有利局面。

貳、文獻探討

一、俄烏戰爭與社群媒體

在俄烏戰爭進程中可觀察到，社群媒體的應用影響了民意與輿論走向，也成為左右戰爭的關鍵，其中俄羅斯擅長使用「駭客戰／網路戰」之資訊作戰手段進行攻擊，阻截烏克蘭地區網路，企圖使政治、經濟及社會運作網絡失能，並搭配訊息操弄、假消息進行「心理戰」；而烏克蘭則利用社群媒體及大眾輿論的影響力進行「心理戰」及「認知戰」（曾柏元，2021；詹祥威，2022 年 4 月 14 日）。俄羅斯是最早在軍事領域利用網路空間的國家之一，長期重視研發以提高在該領域的網路攻擊能力（黃郁文，2022）。從莫斯科 2008 年對喬治亞共和國（Georgia）發動軍事打擊前，就遭指控對喬國發動網路攻擊，造成該國網路癱瘓及重大損失；到 2014 年烏克蘭東部地區戰爭，俄羅斯支持的駭客組織多次對烏軍進行電子與網路攻擊，以癱瘓其系統。2015 年起，烏克蘭已多次遭遇駭客攻擊，導致上百萬居民斷電，甚至在冬天導致首都基輔供電、供暖遭斷。

2022 年俄烏戰爭前，亦利用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¹癱瘓烏克蘭外交、內政、國防及銀行金融等網站，造成內政停擺。在此次戰爭中，俄羅

1 分散式阻斷服務（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簡稱 DDoS）攻擊，為駭客在短時間內利用大量發送網路封包或服務請求，使得受害系統主機因網路頻寬超出負荷或耗盡資源而癱瘓，無法提供正常服務予一般使用者（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2022 年 9 月 6 日）。

斯的戰略仰賴具進攻性的「駭客戰」配合其軍事行動，在開始軍事攻擊前，先行破壞對手的資訊基礎設施、民用及軍用通信，造成網路癱瘓、指揮管理系統失效。除了利用駭客戰進行網路資訊的截斷與癱瘓之外，在心理戰方面，俄羅斯則藉由網路攻擊竊取烏軍士兵個人資料及網際網路協定（Internet Protocol，簡稱 IP）資訊，發送「快離開，不然就等死！」的簡訊，或傳訊息給士兵家屬「你的兒子（丈夫）已經死了」，等家屬急於回撥時，便打電話到士兵手機佔線、或馬上砲擊手機訊號所在位置，企圖使軍、民心渙散（黃郁文，2022）。

面臨俄羅斯以資訊作戰手段攻擊烏克蘭的挑戰時，烏國政府則善用社群網路的擴散影響力，進行「輿論戰」、「心理戰」與「認知戰」，呼籲世界一同抵制侵略者俄羅斯，號召全球反制俄羅斯（張玲玲，2022 年 10 月 14 日）。例如烏克蘭副總理費德羅夫（Mykhailo Fedorov）身兼「數位轉型部長」招募網路自願者協助組建「IT 軍隊」，並以網路安全公司「Cyber Unit Technologies」為核心，組織國內外駭客一同反制俄羅斯的資訊作戰攻擊。不僅保護國內基礎設施不再受駭客攻擊外，甚至針對俄羅斯軍隊進行情報搜集與反擊，連全球最大駭客組織「匿名者（Anonymous）」都響應召集，在推特上宣布正式對俄國展開網路攻擊。除了組織志願駭客反制俄軍，烏國總統澤倫斯基及其政府也利用推特的平臺效應，拉攏民間企業投入修復烏克蘭軍、民網路通訊，如「馬薩爾科技（Maxar Technologies）」出動商用衛星影像，曝光俄國軍事動態。

再者，由於烏國網路設施屢遭破壞，造成民眾通訊受阻，「SpaceX」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即宣布旗下星鏈（Starlink）衛星寬頻網路服務供給烏克蘭，幫助當地因戰火而阻斷的網路仍能繼續提供資訊流通；影音平臺 YouTube 也於 3 月 1 日宣布封鎖「今日俄羅斯」與「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宣傳頻道；而 Facebook、Google、微軟亦跟進封鎖、下架及調整演算法，使得俄羅斯對外宣傳不再被看見，進而失去效用。從上述烏克蘭反制俄羅斯資訊作戰的手段中可以瞭解，烏國面對具有軍事優勢的俄羅斯，利用社群媒體推特進行全球性的認知作戰回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為贏得國際支持，多次透過推文與他國領袖視訊和發布宣言影片，呼籲國際加強制裁俄羅斯，並指責俄軍侵略下的各種「罪狀與暴行」，使俄軍儘管在網路戰及軍事武力層面相較烏軍佔優勢，但在認知戰、輿論戰、心理戰或宣傳戰等廣義資訊作戰領域上，其表現卻弱於烏國（黃郁文，2022；馮建三，2022）。

隨著傳播媒介科技的進步，當前媒體外交已是一個國家布局國際戰略甚至是戰爭行動的關鍵要素，在外交活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顏瑞宏、傅文成，2022）。過去 Cohen（1986）將媒體、外交與公眾之間的關係與功能區分為：（1）媒體為外交決策者和公眾獲得的資訊來源；（2）媒體可作為國家之間外交溝通的平臺；（3）透過媒體可爭取到國內外對公共政策的支持。而 Gilboa（1998）則將媒體外交定義為僅限於媒體與外交間所行構的關係，意即決策者在特定情況下通過媒體訊息的傳播，與國家政府或非國家行為主體建立信任關係，或施予壓力、動員公眾支援談判，從而推動協議簽訂等。因此在當代的傳播環境下，國與國之間得以透過社群媒體進行互動，推動此類平臺在資訊戰的背景下被廣泛運用，更具影響人們的意見與感知。

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政府即運用推特進行該國的戰爭傳播，也因為社群媒體的影響力與擴散力，使訊息能夠短時間內在全球傳散，從而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幾乎能夠同步地參與全球事件（Agarwal et al., 2022, August; Pohl et al., 2022）。由於此次戰爭利用網路空間進行輿論宣傳是過去前所未聞，也從無現任總統如此依賴社群媒體進行國內外交流，甚至建立烏克蘭國家品牌，使得戰爭傳播在新場域的應用提升到了另一種新興戰爭型態的層次（Chen et al., 2022; Serafin, 2022）。以政治外交的角度來看，現今媒體宣傳的時代，運用網路媒體或社群進行的公共外交，可稱為基於網路的數位外交（digital diplomacy）。Bjola & Holmes（2015）在其編著的《數位外交：理論與實踐》（*Digital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書中，將數位外交作為國際政治管理的一種革新形式，認為國家使用數位媒體（如社群）達到外交目的方式，已經改變過去外交訊息管理議程、公共外交、戰略規劃及國際談判的做法，這也同時代表對於新世代的戰爭傳播，可以運用含括更廣泛的社群媒體進行說服溝通，使受眾與影響層面擴展至全球。

從 Alden & Chan（2021）的研究中亦可發現，國家為何、如何有目的性的使用社群媒體平臺作為宣傳管道。研究中提及中國官方推特帳戶自新冠肺炎 COVID-19 流行爆發後，活動量直線升高，而中國積極選擇社交媒體作為數位外交的原因包含了：（1）推特提供有針對性的外展能力，利用標記與主題標籤能快速有效地接觸國際受眾；（2）可以監控與衡量國際輿論；（3）透過推文的議題管理可以轉移公眾注意力，如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利用美國社區種族構成聲明來轉移對新疆人權議題的批評。從這之中亦可得知，國家在藉由選擇特定媒介進行公共外交的發言時，通常帶有宣傳意

涵，且具主題性與目的性。

由於社群媒體的傳播特性與數位環境使然，烏克蘭在俄烏戰爭中能充分利用社群媒體作為外交中的傳播角色，不僅資訊提供更即時、溝通管道更直接，亦能避免媒體機構的干預，使組織本身所建構的框架避免被二次傳播的媒體機構所破壞，更可藉由推文進行戰略溝通敘事，使主體組織策略的運用與傳播能夠直接傳遞予受眾。本研究依此分析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推文，欲瞭解面對戰爭威脅，烏克蘭領導人如何利用框架設定與敘事策略，塑造對己有利的象徵，達到符合戰略目標的戰爭傳播。

二、新媒體時代下的戰爭衝突框架

框架作為一種認知架構，其理論（framing theory）已被廣泛解釋及運用於各種領域，以瞭解人們如何認知與理解世界，並依此進行訊息分類與解釋（Goffman, 1974; Pan & Kosicki, 1993; Scheufele & Tewksbury, 2007）。根據 Entman（1993）的說法，框架是個體選擇如何感知現實，使它們在文本中更加突出，以促進特定問題的定義、因果解釋、道德評價和行動建議。換言之，框架是透過有意識的選擇、排除與強調建構者結構化地篩選、省略或突出某些訊息的方式（de Vreese et al., 2001; Entman, 1993）。過往的框架理論研究著重於分析主流媒體如何影響公眾對世界的看法，例如新聞框架如何影響人們對事件解釋的方式（Neuman et al., 1992; Tuchman, 1978）。此外，框架也被理解為一種試圖影響世界感知的權力象徵（Entman, 2004），亦有學者針對權利菁英和新聞記者如何創造傳播框架進行探討（de Vreese, 2005; De Vreese et al., 2001; Yang, 2003; Zhou & Moy, 2007）。簡單來說，框架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動態過程，其涉及框架构建（框架如何創建）與框架設置（框架與受眾的傾向或相互作用）等面向。

而政府作為權力精英的組織，利用框架的形式構建訊息，期望媒體以積極、正向的態度向公眾展示政策，對於政府來說是常見的手段之一，在外交政策和戰爭領域上的運用亦是屢見不鮮（Entman, 2004）。例如 Douai & Moussa（2013）的研究運用框架分析推特上有關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政治革命推文，發現民眾對於社會變革的訴求與理念能夠在社交媒體中獲得共鳴與支持。透過社群媒體，人們不僅能夠尋找、關注實時資訊，更能夠實際參與「公共對話」，形塑公眾價值。當社群媒體與現實能夠有所

連結，線上的發言或傳播行為亦具備影響線下真實生活之潛力 (Enjolras et al., 2013)。而 Hemphill et al. (2013) 針對美國政治範疇所作的相關研究中，也可發現美國國會議員會積極的透過推文與標籤功能建構框架、引導公眾討論其所選擇的政治議題，進而影響公眾的意見與行為。相似地，Dunning (2018) 的研究探討社群媒體運用於政治宣傳之效果，以美國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為例，檢視其如何運用推文應對媒體與大眾，進行傳播與說服，並形塑政治框架與公共話語權，結果發現川普將推特作為其主要政治宣傳管道之一，搭配極具個人特色的政治風格與框架敘事，能夠影響受眾對於其發布議題（如發展盟友、宣傳議程、回應批評、定義自我等）的看法，甚至信任推文者提出的政治敘事。

在戰事衝突領域中，Manor & Crilley (2018) 的研究發現，在 2014 年加沙戰爭 (2014 Gaza War) 期間，以色列外交部於推特上制定出 14 種框架策略，如強調哈瑪斯 (Hamas) 綁架以色列青少年事件、對以色列城市發射火箭、以色列軍隊行動合理性等，主要目的在使以色列的各項決策合法化，當中甚至加入圖像以強化訊息，使推文中的框架與以色列的整體戰略敘事產生共鳴，達到說服目的。相似地，Khan & Pratt (2022) 的研究檢視巴基斯坦軍方使用社交媒體 (Facebook) 所進行的傳播策略，除了促進軍民對話與公眾參與，更隨著局勢變換 4 種不同的訊息框架（即動機框架：為公眾提供支持軍方打擊恐怖主義的理由與驅力；資訊框架：反恐戰爭的討論與倡議；預測框架：提供大眾反恐的合理行動方案；診斷框架：打擊敵對陣營）發布訊息，以維持公眾對反恐戰爭的支持。

檢視上述研究發現，在戰爭、衝突或政策宣傳中的訊息發布或傳播溝通，軍隊、政府通常具有目的性的說服策略，而這些發布在媒體或社群的訊息多隱含著符合戰略目標的說服框架，且隨著局勢變化，會以不同框架來達到最佳說服目的，甚至影響現實局勢。然而各項衝突或戰爭均有其特殊且複雜的歷史背景、糾葛與考量面向，其傳播框架策略研擬無法一概而論。以俄烏戰爭來說，烏國總統澤倫斯基面對俄國的強勢進逼所採取的戰爭衝突框架為何，為本研究關注重點之一。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1: 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運用社群媒體平臺推特所傳達的訊息框架為何？

三、社群媒體戰爭衝突敘事

承前所述，現今科技與網路的快速發展，政府或國家領導人在面對戰爭衝突時發布相關訊息不再只能仰賴傳統媒體轉達，而是可以直接將社群媒體作為渠道進行戰爭傳播（黃柏欽，2020）。其使用者廣泛、關係網路緊密、成本低與傳播速度快的特點，讓人與人之間的訊息傳遞仰賴社群媒體，也讓社群媒體成為操縱戰爭衝突輿論走向的新場域（胡光夏，2019）。其中，相當重要的關鍵與受到關注及討論的面向即為戰略溝通敘事（Roselle et al., 2014）。因此，框架通常藉由敘事手法進行，而敘事常透過影響意圖的事件、演員和行動表示。根據 Miskimmon et al. (2014) 的說法，敘事具有 3 個核心要素，首先敘事不是自然出現的，而是由具有特定意圖的政治家精心製作的；其次，敘事具有時間維度，它們援引過去來理解現在和預測未來；第三，敘事提供了過去和現在的共同意義，因為它們定義了「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想要什麼樣的世界。敘事有助於創造共同身份，而其不同於框架的主要特徵在於它們賦予過去、現在和未來實現政治目標的意義與方式（同上引）。

Dimitriu (2012) 的研究指出，資訊時代下的戰爭相比於實際戰術行動結果，更看重的是如何運用戰略溝通敘事，引導公眾輿論看待衝突。該研究主要在分析阿富汗戰爭期間美（聯）軍的戰略溝通敘事，認為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若可以解釋事件並說服受眾時，便能獲得對於戰爭的合法性與支持，也反映出戰略溝通敘事如何實質影響民意，以及民意、輿論對於戰事發展的重要影響性。Entman (2004) 則透過分析前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在 911 事件後的評論，展示了其國家領導人如何構建符合戰略目標的敘事框架；該研究發現，小布希總統在面向美國人民的演說時表示，此襲擊對美國而言是種戰爭行為，美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進行善與惡的鬥爭（懲惡揚善），並設定了框架、定義問題（攻擊）、解釋因果（戰爭）、評價道德（善與惡）和行動方案（解決）。相似地，孫秀蕙（2005）亦以符號與敘事結構分析方式，發現 911 事件後小布希總統國會演講稿的說服框架為要求美國人民與世界各國支持美國政府，表明對阿富汗發動戰爭的正當性，其敘事結構原則包括了指名受眾、定義事件（如自由受到攻擊）、說明歸（原）因、提供行動方案等；並將此文本與十字軍東征時的教宗講話稿進行對比，發現兩者皆利用將對立極致化的衝突論述方式，以修辭隱藏真實，說服受眾。

綜整上述政府、軍隊與政治領導者在戰爭衝突中發言的相關研究可以發

現，為了說服受眾，官方發布的訊息經常被包裝成符合該國的戰略目標，即戰爭傳播框架；而其敘述架構亦會利用敘事手法隱藏部分訊息與事實，從而強調、突顯對己有利的訊息和故事。儘管框架和敘事存在些許差異，但常被使用於相似目的，即試圖通過刻板印象、歷史類比和通俗的文化框架來吸引群眾透過共享感而進行傳播（Barthes, 1978）。此部分亦為本研究探討重點，意即檢視烏克蘭總統在俄烏戰爭中對外的推文言說策略，以敘事角度分析烏克蘭總統如何試圖影響國際社會對戰爭的價值觀，創建共享身份感。據此，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RQ2: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推特傳達的訊息框架，其運用的敘事結構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取得與資料蒐集時間

本研究目的為檢視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中推文的訊息框架及其敘事策略。首先，本研究利用 Python 程式語言撰寫的 Twint² 對其發布內容進行爬文，蒐集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官方帳號：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 @ZelenskyyU（網址：<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推文，時間範圍選擇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開戰至 11 月 13 日烏克蘭收復南部重鎮赫爾松止，以此階段性的戰略成果作為觀察俄烏戰爭事態的蒐集區間，共計 903 則推文。

二、資料篩選與過濾

澤倫斯基總統推文態樣多以內容相同的烏克蘭語與英語並行，輔以立場相似的國家語言（如法文、中文、西班牙文等）。本研究欲瞭解烏國領導人對外社群言說框架及其敘事手法，故以能夠被廣泛傳散的國際主流語言—英語推文為主，據此篩選條件下，過濾後總計 447 篇推文作為研究分析樣本。

2 Twint 為 Python 程式語言編寫的 Twitter 抓取工具，可以擷取特定帳戶公開推文或主題標籤等相關內容（Twint, n.d.）。

三、資料分析步驟與方法

資料蒐集及篩選完成後，本研究首先以 Twint 搜集文本資料，利用 Twitter 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簡稱 API）與使用者之個人資料金鑰（token）取得授權進行爬文，並參考過去探討推特主題框架的相關研究方法（如 Khan & Pratt, 2022; Manor & Crilley, 2018），利用工具包 Gensim 進行 LDA 主題模型資料分析。其分析架構為基於 *mallet* 工具包之吉布斯分佈（Gibbs）進行運算，參數設定為 $\alpha = 50$ 、iterations = 1000、topic_threshold = 0.0。隱含狄利克雷分布為主題建模演算法，可將文本內容分類成不同主題，進行內容框架的探索（Barna & Knap, 2022; Heidenreich et al., 2019; Hubner, 2021; Yang et al, 2021）。該模型分析方法具有兩個前提：（1）每篇文件都是由數個主題（topic）所形成；（2）每個主題都可以使用數個重要的字詞（word）來描述，且相同用詞可以同時出現在不同主題之間。

LDA 的模型分析可以將資料依配適度高低分類調整為最適當的主題數目，並利用非監督式機器學習³方式，找出資料文件背後所隱含的主題框架結構（Steyvers & Griffiths, 2007）。再者，LDA 模型利用吉布斯分佈的分配方式，將文本內經常出現的詞彙歸納成關鍵詞彙，依此快速標定文本內容，進行分類，並運用字詞權重檢視文本之於主題的歸屬是否正確，故本研究採非監督式文本分類，在開始運行程式前並無文本主題預設立場，而是視字詞與文本形成的最適主題分類。

在 LDA 主題模型分類完後，本研究依其分析結果，針對各主題所運用的框架結構和敘事手法進行解析，檢視澤倫斯基總統在戰爭衝突期間的推文態樣，及其如何透過社群言說展現烏國價值、需求與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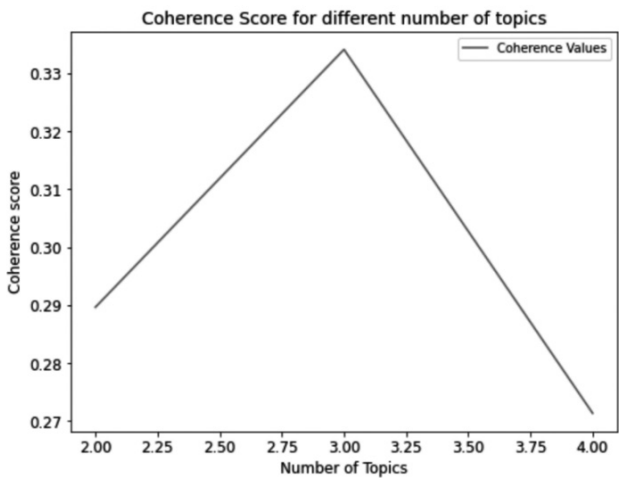
3 非監督式機器學習其概念為初始不設定主題，直接交由機器判別，計算出在一定範圍內的最適分配；反之，監督式學習為初始即設立主題並標註主題內容，使機器在分類文本時依先前所設定的主題進行分類，惟此一方式容易造成機器強制將所有文本分類，即便該文本不符合原先設立之主題內容（Banerjee & Basu, 2007, April; Materna, 2012）。

肆、研究結果

一、隱含狄利克雷分布的主題模型分析

在運用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方式觀察 LDA 一致性分數後的結果顯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社群媒體上的推文框架建議分為 3 群（如圖 1），再檢視各主題關鍵字，依詞性進行分類與歸納後從中探索各主題意義，進而為後續主題命名提供參考（如表 1）。

圖 1：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社群媒體推文主題一致性分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 1：主題模型分群與關鍵詞整理

主題分群	關鍵詞
主題 1 (158 則)	主題詞：aggression（侵略）、security（安全）、situation（局勢）、humanitarian（人道主義）、war（戰爭）、crimes（罪行） 行為詞：talks（會談）、dialogue（對話）、countering（反擊）、discussed（討論）、thanked（感謝）、informed（知情）、held（舉行） 稱謂詞：UA（烏克蘭）、EU（歐盟）、Russian（俄羅斯）、Russia（俄羅斯）、president（總統）、aggressor（侵略者）
主題 2 (149 則)	主題詞：conversation（對話）、financial（經濟）、country（國家）、common（共同）、coalition（聯合）、military（軍事） 行為詞：support（支持）、defense（防禦）、phone（電話）、sanctions（制裁）、assistance（援助）、talked（交談）、joint（聯合）、discussed（討論） 稱謂詞：Ukraine（烏克蘭）、Prime（總理）、Minister（部長）

主題 3 (140 則)	主題詞：people (人)、international (國際)、world (世界)、cooperation (合作)、peace (和平)、pressure (壓力)、relations (關係)、security (安全)、missile (導彈)、
	grateful (感激)、important (重要)、global (全球)、eve (前夕)
	行為詞：decision (決定)、solidarity (團結)、strengthening (加強)、supporting (支持)
	稱謂詞：UA (烏克蘭)、US (美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推文主題框架

經由 LDA 主題模型分析後，本研究將澤倫斯基對於戰爭衝突期間的推文框架區分為 3 個主題，分別為「人道主義迫害」框架 158 則、「援助與抵制」框架 149 則，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 140 則：

(一) 「人道主義迫害」框架

觀察澤倫斯基的社群媒體推文後可發現，澤倫斯基將俄烏戰爭的後果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損失命名為「人道主義迫害」，從關鍵字如 aggression (侵略)、humanitarian (人道主義)、war (戰爭)、crimes (罪行) 可見端倪；而在行為詞上的 talks (會談)、dialogue (對話)、countering (反擊)、discussed (討論)、thanked (感謝) 則可看出澤倫斯基積極地對外進行協商與討論、尋求合作與援助，而將給予支持的國家或組織行動，上升到對「人道主義的援助」，而非僅是單純的「幫助烏克蘭」。客觀來說，俄羅斯的入侵行動造成許多後果，包含烏克蘭主權受到侵害、烏克蘭國土遭到入侵、經濟重創、民主體制受到威脅等，人民的傷亡只是其中一個結果，然而，在如此多種類型的傷害與損失之下，澤倫斯基在論述時卻選擇「人道主義」做為俄羅斯侵略行動的結果，更以此作為主要訴求，將烏克蘭平民傷亡、人民必須逃離家園列為人道主義受迫害的實證例子，藉此呼籲國際援助與支持。

此外，國際社會或組織提供的支持行動也以多元角度呈現。從其推文中可發現，除了人道走廊設立、提供人民醫療援助等在事實上屬於人道主義幫助外，其它對於俄羅斯的反擊、打壓與制裁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援助、討論讓烏克蘭加入歐盟等，其實並非實質人道主義援助範疇。然而，這些合作行為在澤倫斯基的推文中卻與「人道主義救助」進行了連結與強調。訴諸於人道主義是樞紐、是象徵的重要性，它連結著「俄羅斯」與「惡」，亦連結著「國際社會援助」與「善」。澤倫斯基以人道主義為烏克蘭現況下註解，

定義烏克蘭所受到人道主義迫害，是弱勢、受害者的一方，並將矛頭直指：加害者是誰？俄羅斯。俄羅斯不僅是發動戰爭的罪犯、是烏克蘭的侵略者，更代表著邪惡方，甚至是「人道主義的踐踏者」。

另一方面，澤倫斯基利用人道主義，將「援助烏克蘭」等同於「維護人道主義」的行為進行串連，如其他國家與組織對於烏克蘭所提供的經濟、軍事與聲援，甚至抵制俄羅斯的行為（包括停止進出口商品、服務），亦都被納入「維護與捍衛人道主義」的旗幟下，是善的舉動。因人道主義作為世界共同追求的人權保障，彰顯崇高與美好品德，也代表心向光明與善良。因此，澤倫斯基將烏克蘭的受創以人道主義受迫害作為代表，使用「人道主義災難」、對烏克蘭人的「種族滅絕」（statements as genocide of UA people）等敘述手法，將焦點放在人民的受難上，呈現俄羅斯入侵行動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人民，進而塑造以人民為本的形象角色，為後續呼籲的國際支援合作，皆是為了人民，而非為了國家利益與反擊（攻擊）行動作為奠基（框架推文範例如圖 2）。

圖 2：「人道主義迫害」框架推文範例




（作者翻譯：與BG總理 @KirilPetkov 進行了建設性對話。瞭解反擊RU侵略的過程。討論了UA村鎮所發生的危急人道主義局勢。我們必須共同制止人道主義災難！）

**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

@ZelenskyyUa

🇺🇦 Ukraine government official

...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address PACE today. For attention to . Commend today's adoption of the PACE resolution designating the current regime of the RF as terrorist. This is a powerful signal to the world community and Russia that punishment for crimes is inevitable!

翻譯推文

下午8:54 · 2022年10月13日

（作者翻譯：感謝今天有機會在 PACE 上發言。請求關注 UA。讚揚今天通過的 PACE 決議，將 RF 的當前政權指定為恐怖分子。這向國際社會和俄羅斯發出了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即對犯罪的懲罰是不可避免的！）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在「人道主義迫害」框架中，澤倫斯基在對戰爭的結果敘述中並非著重在量化的損失，而是以善與惡的道德標準來進行歸因；並非計算失去多少國土面積，重創幾億元的烏克蘭經濟，而是將人們對於戰爭的看法轉換到善惡認知層面，並將其他戰爭結果省略，積極以人道主義為主軸進行連結，將烏克蘭國家損失提升至世界共通的人道主義價值遭受迫害，將俄羅斯定義為俄烏戰爭的「因」與「惡」。而在框架所連結的「援助烏克蘭」等同於「援助人道主義」的行動上，則賦予解釋「烏克蘭為了因應俄羅斯的惡」所要求的援助動機，推動世界共同抵制俄羅斯或尋求它國經濟與軍事武器援助等訴求變得合理，並依此延伸到第 2、3 的主題框架。

（二）「援助與抵制」框架

前述「人道主義」框架中，澤倫斯基將兩國做了強烈的對比，將俄羅斯定義為「踐踏人道主義價值的惡」；烏克蘭則是「人道主義受迫害的象徵」。為了對抗惡，世界應當選擇「善」，且給予支持。因此，在第二主題框架中可以發現，澤倫斯基提供給選擇「善」的國家與組織有效的行動方案，也就是期能與烏克蘭共同抵制對俄羅斯在經濟和軍事的合作事務。此框架經常出

現的 conversation (對話)、support (支持)、defense (防禦)、security (安全)、financial (金融)、military (軍事) 等字詞，將澤倫斯基努力爭取外援或尋求合作等行為，都列為基於人道主義考量，而受幫助的主體為 Ukraine (烏克蘭)，感謝的對象為它國 Prime (總理) 和 Minister (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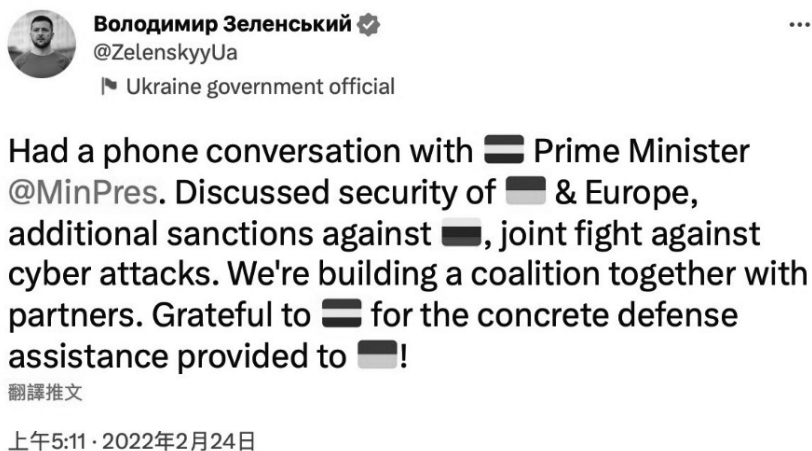
其中經濟上的援助包含了善用難民安置、物資採購、設施修復和國防武器添購等軍事項目，或是直接請求它國派送武器等軍事援助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主題框架中，對於烏克蘭來說，即使同樣使用於戰爭的殺傷性武器，其能立基於「抵禦入侵家園的外敵」與「收復家園」的立場產生自我保護的傳播訴求，而不會落入它國在金援戰爭行為中的道德討論，產生負面影響力。透過這樣傳播建構過程有助於它國對於烏克蘭的經濟支持是被「讚賞」的作為，代表對「人道主義象徵烏克蘭」的感謝，也是維護「人道主義」的舉動（框架推文範例如圖 3）。

澤倫斯基藉由不斷宣揚前述「人道主義迫害」框架與善惡歸因的連結，以揚善於世的價值觀刺激世界「他者」做出支持行動。此外，澤倫斯基在「援助與抵制」框架中提供行動方案如（1）支持烏克蘭：對烏克蘭進行人道救援與提供武器等；（2）終止與俄羅斯的合作：停止服務與經濟制裁等。而當國家或組織按照這樣的方式行動時，澤倫斯基便會利用社群媒體告昭國際「某國／某組織表示一同制裁俄羅斯——代表善」，除了站在善的立場進行了感謝，亦以樹立「善的榜樣」和高道德標準讓國際社會得以參考。因此在此框架的行動建議上，除了呼籲抵制俄羅斯外，也提供了支持烏克蘭的實質選項與參考，進而連結到後續第 3 框架。

（三）「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

除了前述與人道主義連結的善惡歸因、提出援助／抵制行動方案等框架外，澤倫斯基在此主題框架中將推文範圍延伸至訴諸世界各國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陣線、聯合抵制侵略者框架。即俄羅斯迫害烏克蘭人民，便是破壞人道主義，是「惡」，因此若國際社會組織與俄羅斯的合作，或是提供服務予俄羅斯，就是「同流合污」。藉由此論述，呼籲國際一同制裁俄羅斯，與烏克蘭站在同一線，對於俄烏戰爭的「善惡」陣營做出選擇。從澤倫斯基的推文內容中可發現，此框架主題詞聚焦於 war (戰爭)、cooperation (合作)、peace (和平)、relations (關係)、security (安全)、solidarity (團結)。換言之，

圖 3：「援助與抵制」框架推文範例



（作者翻譯：與 NL 總理 @MinPres 進行了電話交談。討論了 UA 的安全性；歐洲，對 RU 追加製裁，聯合打擊網絡攻擊。我們正在與合作夥伴一起建立聯盟。感謝 NL 為 UA 提供的具體防禦援助！）



（作者翻譯：與歐盟委員會主席 @vonderleyen 進行了電話交談。盡快討論了 #EU 宏觀金融援助的分配。強調需要準備第 8 套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向俄羅斯公民發放簽證。）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澤倫斯基訴求發動戰爭的俄羅斯為道德的惡，而烏克蘭為和平訴求的善；若選擇支持俄羅斯，便是選擇惡；若要選擇善，便要支持烏克蘭。因此，支持和平即代表「與烏克蘭同一陣線」。

在此類框架中，澤倫斯基藉由概念抽換的方式來解釋俄烏戰爭的支持問題，並將此提升到道德選擇的層級，使得國際社會組織若要符合道德標準，便不得與俄羅斯合作，或是與俄羅斯有所往來。此外，道德的善惡選擇亦影響了俄烏戰爭的支持問題，若不在俄羅斯與烏克蘭選擇一邊，即使旁觀不發聲，也就代表著對惡的視而不見，便是支持殘暴入侵行為的兇手。在這樣嚴重的指控下，國家、企業或組織為了不落入「支持戰爭」或「支持血腥暴力」的道德期許範疇裡，便會選擇支持烏克蘭，與烏克蘭站在同一陣線（框架推文範例如圖 4）。

圖 4：「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推文範例



（作者翻譯：俄羅斯因為討厭自由而在 UA 造成了人道主義災難。但這也讓世界看到了俄羅斯所造成的破壞。UA 捍衛了自由、尊重、與生活。這就是為什麼 @ZelenskaUA 創建了這個基金會 – @Zelenska_FND。這是一項極其崇高的事業；我鼓勵你們所有人加入）



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

@ZelenskyyUa

Ukraine government official

Now can be no 'half' decisions or 'half-tones'! There is only black and white, good or evil! You are either for peace or support the bloody Russian aggressor to kill Ukrainian children and women. @Microsoft @Oracle @SAP, stop supporting your products in Russia, stop the war!

翻譯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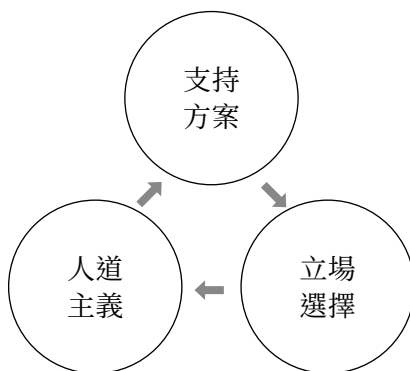
上午2:17 · 2022年3月14日

(作者翻譯：現在不能作「半」決定或「半調子」！只有黑與白，善與惡！
你要麼是為了和平，要麼是支持血腥的俄羅斯侵略者殺害烏克蘭兒童和婦女。
 @Microsoft @Oracle @SAP，停止在俄羅斯供應您的產品，停止戰爭！)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 (<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總括來說，前述「人道主義迫害」、「援助與抵制」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主題框架，顯示了澤倫斯基如何利用推特在面對戰事相關問題上進行歸因，並影響社會大眾對於善惡立場的選擇，進而促使國際具體付諸行動展現表態支持烏克蘭並抵制俄羅斯。因此，此3個主題框架之間並非完全互斥，而是呈現互補延伸之關係（如圖5）。

圖5：框架互補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敘事架構

整體來說，透過檢視烏國總統推文的敘事架構可以發現，澤倫斯基利用「人道主義」進行「俄羅斯＝惡」的歸納，而後再利用「善惡選擇」迫使國際社會表態，將國際立場區分為二——非黑即白／非善即惡，藉此選擇可靠的盟友；而當盟友確立後，則透過多次「談話」努力，爭取到「對烏支持／

對俄制裁」之目的（推文範例如圖 6）。而在澤倫斯基推文架構上可發現他經常使用的形式多為動詞在前，省略主詞，並藉由標記人物為第一部分表述，句型結構為：「（我）已經與（@人物名稱）完成談話」，代表身為國家領導人能夠放下身段，積極尋求他國或外在可靠勢力協助烏國度過危機。同時，他亦強力表述國家領導人並沒有放棄國家、也沒有放棄人民的信念，而是為了尋求外援而積極的行動著，請公眾相信「我」（澤倫斯基）有能力帶領大家度過戰事威脅。

推文第二部分則通常為敘事框架主體，句型結構為：「（我們）談論了關於_____（主題），（我）非常感謝（對方）所提供的支持（抵制）模式_____」。此處則依照上述主題框架主要區分為「人道主義迫害」、「援助與抵制」以及「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等 3 類。此 3 類主題是層層相遞的互補概念，可以從敘事結構判斷出以下特徵：當談論戰爭下的人道主義相關議題時，後續所尋求到的便是對於烏克蘭難民的支持；若是已經在支持烏克蘭／抵制俄羅斯的主題框架下，則會更進一步對烏克蘭經濟及軍事上提供援助支持或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當前述行動方案確立時，推文內容除了會感謝與烏克蘭（善）站在同一陣營外，也告訴了世界何者為正確的選擇，進行善惡立場的表態。


最後一部分為標記（#hashtag）功能的運用，在此次資料中，以 #Stand-UpForUkraine、#StandWithUkraine 和 #StopRussia 等為主要的主題標籤，可概分為「支持烏克蘭」與「阻止俄羅斯」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而這兩類標籤除了加強語氣外，更藉由社群媒體平臺的特性，以口號方式將事件與主題框架連結。因此，大眾或可藉由 Hashtag 所表達的意思（多為祈使句，代表簡潔有力的發願、疾呼），將現實世界的判斷標準套入社群網路標籤所形塑出的善惡框架中，進而與俄烏戰爭的歸因進行聯想。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與貢獻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其發展與動向受到了全球關注，雖然烏克蘭面對俄羅斯的強勢進逼，在硬體及武裝力量上趨於劣勢，但其總統澤倫斯基在面對如此不利情勢下，仍設法藉由社群媒體推文框架建構與敘

圖 6：敘事架構推文範例




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 ✓
@ZelenskyyUa
🇺🇦 Ukraine government official

I thank my friend Mr. President of 🇹🇷 @RTErdogan and the people of 🇹🇷 for their strong support. The ban on the passage of 🇷🇺 warships to the Black Sea and significant military and humanitarian support for 🇺🇦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day. The people of 🇺🇦 will never forget that!

翻譯推文

下午9:27 · 2022年2月26日

(作者翻譯：感謝我的朋友TR @RTErdogan總統先生和TR人民的大力支持。禁止RU軍艦進入黑海以及對UA重大的軍事和人道主義支持對UA極為重要。UA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Володимир Зеленський ✓
@ZelenskyyUa
🇺🇦 Ukraine government official

Just finished an hour-long conversation with @POTUS. Shared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on the battlefield and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Talked about specific defensive support, a new package of enhanced sanctions, macro-financial and humanitarian aid.

翻譯推文

上午12:13 · 2022年3月31日

(作者翻譯：剛剛與@POTUS完成了一個小時的對話。共同評估戰場上和談判桌上的局勢。談到了具體的防禦性支持、加強制裁的新計畫、大量金融和人道主義援助。)

資料來源：澤倫斯基官方推特 (<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

事手法，影響國際社會對於兩國的觀感與看法，積極爭取國際認同與支持。本研究即以烏國總統官方推特推文作為分析對象，利用資料探勘方式、戰爭衝突框架以及敘事視角檢視其言說策略，探究其如何利用社群與推文形塑對己有利的輿論導向與國際情勢。

本研究發現烏克蘭國家領導人在面臨戰爭威脅的情境下，運用社群媒體特性及科技所賦予的屬性如即時性、互動性和擴散性等，將其直接運用於戰事中，改變了現代新型態戰爭的態樣，這與現有胡光夏（2019）、黃柏欽等人（2020）研究中所提及當今戰爭衝突中社群媒體的重要角色相呼應。面對國土龐大且軍武力量強大的俄羅斯，澤倫斯基選擇使用更靈活的宣傳方式應對這場戰爭，利用推文框架與敘事手法試圖扭轉國際社會大眾的認知與國際輿論的傾向。更精準地來說，烏國總統藉由「人道主義迫害」、「援助與抵制」、「與烏克蘭同一陣線」等 3 個主題框架相互扣連，並輔以平臺的標註（@）與標籤（# hashtag）等功能，將事件與框架更加緊密連結，影響國際社會對俄烏戰爭歸因，將站在烏克蘭一方的人道主義救助者形象化為符合社會道德期許的模範，進而在這場傳播科技下的輿論戰中取得先機。此現象與過往學者（如 Darley & Latané, 1968）提出的「旁觀者效應」（bystander effect）有異曲同工之妙，藉由「點名」（具體的指定）方式，使被點名的人物或組織，在「受到委託」後有更高的機會做出利他的具體行動；而推文中針對道德期許行為的設定，亦有較高的概率影響接收者執行符合其規範的樣貌，例如產生援助（烏克蘭）／抵制（俄羅斯）之行為表現（Bryan & Test, 1967; Eisenberg-Berg & Geisheker, 1979）

此外，本研究亦歸結出烏國總統推文主要的框架敘事意涵。首先，「人道主義迫害」框架以人道主義作為普世的善惡價值，描述烏克蘭人權主義受到威脅，進一步描述侵略者俄羅斯為踐踏人道主義的迫害者，連結戰爭中兩國立場，強化國際社會的道德之分，而此框架策略亦符合過往策略溝通中強調「認同化」的目標，意即透過貼文取得「連結」（connection），建立認同關係（方鵬程等人，2015）。其次，「援助與抵制」框架則以爭取國際實質援助為目的，提供他國／組織團體有效的行動方案—以經濟或軍事支持烏克蘭（善），並抵制俄國（惡）的行動。此框架則呼應了過往戰爭傳播文獻中所提及的，面對戰事威脅，如何透過媒體進行資訊傳遞，並利用框架敘事說服目標受眾以爭取支持力量／聲量，有助達成戰略目標（Dimitriu, 2012；方鵬程等人，2016；孫秀蕙，2005）；最後，「與烏克蘭同一陣線」框架則呼籲

國際社會應該與烏克蘭之善共同抵制俄羅斯之惡（侵略者），藉由發表聲明譴責旁觀者或要求世界表態等方式，表明非善即惡的立場之分，此框架亦與 Entman（2004）分析前美國總統小布希在 911 事件後發表的敘事架構相似，例如界定善與惡的鬥爭，呼籲受眾團結懲惡揚善等。

承上，澤倫斯基在俄烏戰爭期間運用推文所呈現的敘事架構，相比於完整故事具起、承、轉、合之書寫，其發文主題明確且敘事架構淺顯，推文內所隱含的對立意意識形態較少，較常見的方式為直接攻擊俄羅斯與表態俄烏雙方的善惡立場，而這樣淺白的傳播策略或許與平臺的字元數侷限有關。推特以短文建構社群對話為主（Wang & Yang, 2020），讓即時訊息能夠簡潔且快速地被傳散（Boyd et al., 2010, January），若能妥善運用此特性，則可將資訊如同重點摘錄般強調與宣傳，反之則有可能落入發布資訊破碎或語意不明等窘境（Coeseemans & de Cock, 2017）。換言之，雖然字數限制有可能侷限發文者在意義上的表達，卻也能夠將欲傳達的意識形態利用簡短的模組化訊息不斷地重複發送，如澤倫斯基在戰事期間發布的推文皆專注於打擊俄羅斯與尋求國際援助，便是熟用媒介平臺特性所建構出的戰爭數位傳播策略。

總結來說，誠如 Goffman（1974）所述，框架為不同情境與訴求提供了相對應的「特定期望」。同樣地，在面對戰事威脅，本研究中所提出 3 個不同主題框架的運用也各自搭配不同的目的。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國家領導人運用社群媒體作為面對戰爭威脅的傳播工具之一，其框架的建構與敘事策略不僅呼應過往文獻中提及單位／組織／團體在面對外在威脅或危機時，如何妥慎運用「溝通」手段提升大眾對形象認知與建立支持的重要性（胡光夏，2017；Ray, 1999；Sturges, 1994），也擴展在戰爭與宣傳研究領域之範疇。具體來說，過往的文獻多以歷史戰爭為主體且以傳統媒體為主要研究面向（方鵬程，2010；蔡綺，2008；鍾淑惠，2015），而本研究以俄烏戰爭中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官方推特為研究對象，除了印證學者曾提及的社群媒體在現代衝突與戰爭中的重要角色（胡光夏，2019），也為現代戰爭與宣傳提供了實際例證與重要參考。

最後，若反思社群媒體對於政治與戰爭傳播之影響，亦可從網路社群如何將過去遙不可及的政治精英拉近到公眾「眼前」談起。國家、政府組織與政客們藉由註冊社群帳號、定時發文、直接回覆留言、轉發與按讚等方式與民眾進行互動與建立維繫關係，不僅拉近了與發文者的距離，亦透過網路凝聚群眾力量（Moon & Yang, 2021），讓「事件」發生時，網路群眾產生參與

感與使命感，透過自發性的轉推、發表評論和情緒表態等多元方式，如同真實地參與世界集會行動一般，形塑「這件事情很重要」的情境與共識 (Emrich et al., 2001; Gustafsson & Weinryb, 2020; Tur et al., 2022)。因此，國家、政府組織與政治家利用網路媒體、平臺將其欲推波的觀點傳散到全世界，促成事件朝其所望之方向發展，此時，即便是推文的「隻字片語」，亦能煽動世界。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在研究限制部分，本研究資料分析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社群媒體推文為主，雖然在資料蒐集階段時亦針對其國際性（英語）貼文內容進行篩選，惟分析結果僅能呈現烏國領導人的社群框架及敘事策略，對於整體國家在面對戰事威脅的戰略、傳播溝通策略的瞭解仍較為缺乏，未來若要更進一步檢視烏克蘭國家整體的反應策略或政府如何應對此類危機，可以考慮納入該國家對外新聞發言單位、副總理或國防部等相關官方言說資料，或許能夠更完整的觀察烏克蘭國家的傳播應對策略，亦能更全面且多元的地探討國家面對戰事威脅言說框架的規劃與應用。

再者，本研究雖以烏克蘭收復南部重鎮赫爾松，取得階段性戰略成果的 11 月 13 日作為資料蒐集區間，但實際上戰事仍未停歇，未來若能將資料蒐集與分析範圍涵蓋至整場戰事，將有助於對戰爭前、中、後等事態狀況與發展脈絡有更全面的瞭解與認識，也能較完整檢視和比較戰爭衝突各階段中的傳播策略、主題框架與敘事架構，促使更加完整呈現整體描述與分析結果。

最後，本研究運用框架與敘事方法分析澤倫斯基之推特論述，結果發現其敘事結構較為簡單且淺顯，這或與平臺字元數侷限了完整意涵的表達有關。未來研究若能將烏國政府公開聲明稿、外交部記者會發布之內容或澤倫斯基於國際會議上演講的講話稿等內容進行全面性比較與分析，將有益於更完整的檢視與瞭解國家領導人面對戰爭威脅時對外傳遞的敘事結構。

參考文獻

- 方鵬程 (2007)。《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秀威資訊。
- (2010)。〈總體戰爭時期與冷戰時期的宣傳戰〉，《復興崗學報》，98：51-78。
- 方鵬程、延英陸、吳冠輝、胡光夏、徐蕙萍、陶聖屏、張梅雨、陳心懿、陳竹梅、陳佳胤、陳聰盛、曹開明、傅文成、葉思吟、廖名湖、劉大華、邊明道 (2016)。《軍隊公共事務 15 講》。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方鵬程、延英陸、李泰爾、胡光夏、徐蕙萍、陶聖屏、黃鈴媚、曹開明、傅文成、劉大華 (2015)。《軍隊危機傳播 15 講》。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2022 年 9 月 6 日)。〈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DDoS) 趨勢與防護〉，《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上網日期：202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twcert.org.tw/newspaper/cp-64-6481-deb5b-3.html>
-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2022 年 2 月 24 日)。〈普京發表電視講話：決定在頓巴斯開展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上網日期：2023 年 2 月 4 日，取自 <https://big5.sputniknews.cn/20220224/1039534647.html>
- 胡光夏 (2017)。〈社群媒體與國軍危機溝通案例分析〉，傅文成 (編)，《社群媒體與軍事傳播》，頁 113-128。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2019)。〈新媒體時代下的輿論戰攻防〉，劉大華 (編)，《新媒體時代下的軍事傳播與輿論戰》，頁 31-44。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孫秀蕙 (2005)。〈符號、敘事結構與公共關係中的「說服」：以九一一事件布希演講稿為例〉，《關係管理研究》，1：115-159。
- 張玲玲 (2022 年 10 月 14 日)。〈【全民國防】借鑑烏俄戰爭 洞悉資訊心理戰〉，《青年日報》。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539189>
- 曾柏元 (2021)。〈俄羅斯運用社群媒體進行資訊戰之分析—以 2014 年克里米亞事件為例〉，《陸軍學術雙月刊》，57 (576)：43-68。
- 馮建三 (2022)。〈不實資訊、廣場事件與戰爭責任：理解烏克蘭〉，《傳播文化與政治》，15：161-201。
- 黃柏欽 (2020)。〈社群媒體武器化影響、運用與能量建構〉，《國防雜誌》，

35 (3) : 1-30。

黃郁文 (2022)。〈淺析俄羅斯「網路戰」—以 2022 年「俄烏戰爭」運用為例〉，《海軍學術雙月刊》，56 (4) : 88-104。

楊駿宗 (2022 年 2 月 26 日)。〈「今夜非常難熬」澤倫斯基自拍堅守基輔穩軍心〉，《TVBS 新聞網》。上網日期：2023 年 2 月 12 日，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725882>

詹祥威 (2022 年 4 月 14 日)。〈俄烏戰爭中的「混合戰」運用〉，《國防安全雙週報》。上網日期：2023 年 1 月 20 日，取自 <https://indsr.org.tw/respublicationcon?uid=12&resid=1875&pid=1631&typeid=3>

蔡綺 (2008)。〈美國二戰宣傳海報中的戰爭圖像符號研究〉，《商業設計學報》，12 : 97-116。

鍾淑惠 (2015)。〈從圖像看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3 : 45-81。

顏瑞宏、傅文成 (2022)。〈外交新常態？以主題及網絡建模技術探索中共 Twitter 外交的戰狼溝通策略〉，《資訊社會研究》，43 : 67-113。

Agarwal, N. S., Pun, N. S., & Sonbhadra, S. K. (2022, August). *Exploring public opinion dynamics on the verge of World War III using Russia-Ukraine war-tweets dataset*. Paper presented at KDD-UC 2022, Washington DC.

Alden, C., & Chan, K. (2021). Twitter and digital diplomacy: China and COVID-19. *LSE Ideas*. Retrieved February 12, 2023, from https://eprints.lse.ac.uk/110754/1/LSE_IDEAS_twitter_and_digital_diplomacy_china_and_covid_19_strategic_update.pdf

Barna, I., & Knap, Á. (2022). Analysis of the thematic structure and discursive framing in articles about Trianon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online Hungarian press using LDA topic modelling. *Nationalities Papers*, 1-19.

Barthes, R. (1978). *Image, music, text* (S. Heath, Trans.). Hill and Wang.

Banerjee, A., & Basu, S. (2007, April). Topic models over text streams: A study of batch and online unsupervised learning. In C. Apte, D. Skillicorn, B. Liu, & S. Parthasarathy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007 SIA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 (pp. 431-436).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Bjola, C., & Holmes, M. (Eds.). (2015). *Digital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 (1st ed.). Routledge.
- Boyd, D., Golder, S., & Lotan, G. (2010, January). Tweet, tweet, retweet: Conversational aspects of retweeting on twitter. In *2010 43r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pp. 1-10). IEEE. <https://doi.org/10.1109/HICSS.2010.412>
- Bryan, J. H., & Test, M. A. (1967). Models and helping: Naturalistic studies in aid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400-407.
- Chen, B., Wang, X., Zhang, W., Chen, T., Sun, C., Wang, Z., & Wang, F. Y. (2022). Public opinion dynamics in cyberspace on Russia–Ukraine War: A case analysis with Chinese Weibo.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ystems*, 9(3), 948-958.
- Coesemans, R., & de Cock, B. (2017). Self-reference by politicians on Twitter: Strategies to adapt to 140 character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6, 37-50.
- Cohen, Y. (1986). *Media diplomacy: 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ge*. Routledge.
- Darley, J. M., & Latané,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 Dimitriu, G. R. (2012). Winning the story wa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2), 195-207.
- de Vreese, C. H., Peter, J., & Semetko, H. A. (2001).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2), 107-122.
- de Vreese, C. H. (2005). News framing: Theory and typology.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Document Design*, 13(1), 51-62.
- Douai, A., & Moussa, M. B. (2013). Twitter frames: Finding social media's "influentials" during the "Arab Spring". In A. A. Olorunnisola & A. Douai (Eds.), *New media influence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frica* (pp. 202-217). IGI Global.
- Dunning, E. (2018). #Trumpstyle: The political frames and Twitter attacks of Donald Trump. *The Journal of Social Media in Society*, 7(2), 205-231.

- Eisenberg-Berg, N., & Geisheker, E. (1979). Content of preachings and power of the model/preacher: The effect on children's generos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2), 168-175.
- Emrich, C. G., Brower, H. H., Feldman, J. M., & Garland, H. (2001). Images in words: Presidential rhetoric, charisma, and great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6(3), 527-557.
- Enjolras, B., Steen-Johnsen, K., & Wollebaek, D. (2013). Social media and mobilization to offline demonstrations: Transcending participatory divides?. *New Media & Society*, 15(6), 890-908.
- Entman, R. M. (1993).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 (2004).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lboa, E. (1998). Media diplomacy: Conceptual divergence and application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3), 56-75.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ustafsson, N., & Weinryb, N. (2020). The populist allure of social media activism: Individualized charismatic authority. *Organization*, 27(3), 431-440.
- Heidenreich, T., Lind, F., Eberl, J. M., & Boomgaarden, H. G. (2019). Media framing dynamics of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A comparative topic modelling approach.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32(Special_Issue_1), i172-i182.
- Hemphill, L., Culotta, A., & Heston, M. (2013). Framing in social media: How the US Congress uses Twitter hashtags to frame political issues. Available at SSRN: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17335
- Hubner, A. (2021). How did we get here? A framing and source analysis of early COVID-19 media covera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38(2), 112-120.
- Khan, M. K., & Pratt, C. B. (2022).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The Pakistan military's use of social media against terrorism. *Media, War & Conflict*,

- 15(4), 450-485.
- Manor, I., & Crilley, R. (2018). Visually framing the Gaza War of 2014: The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Twitter. *Media, War & Conflict*, 11(4), 369-391.
- Materna, J. (2012). LDA-Frames: An unsupervised approach to generating semantic frames. In Gelbukh, A. (E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intelligent text processing. CICLing 2012.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7181(pp. 376-387). Springer-Berlin-Heidelberg.
- Miskimmon, A., O'loughlin, B., & Roselle, L. (2014).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Routledge.
- Moon, B., & Yang, S. U. (2021). Developing the scale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ialogic communication (PCDC) during the 2017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South Korea.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47(1), 102000.
- Neuman, W. R., Neuman, R. W., Just, M. R., & Crigler, A. N.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elle, L., Miskimmon, A., & O'loughlin, B. (2014). Strategic narrative: A new means to understand soft power. *Media, War & Conflict*, 7(1), 70-84.
- Pan, Z., & Kosicki, G. M. (1993).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0(1), 55-75.
- Pohl, J., Seiler, M. V., Assenmacher, D., & Grimme, C. (2022). A Twitter streaming dataset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onset of the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n 202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066543>
- Ray, S. J. (1999).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the airline industry*.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Serafin, T. (2022). Ukraine's president Zelensky takes the Russia/Ukraine War viral. *Orbis*, 66(4), 460-476.
- Sturges, D. L. (1994). Communicating through crisis: A strategy for organizational survival.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 297-316.
- Scheufele, D. A., & Tewksbury, D. (2007). Framing, agenda setting, and

- priming: The evolution of three media effects mode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9-20.
- Steyvers, M., & Griffiths, T. (2007). Probabilistic topic models. In T. K. Landauer, D. S. McNamara, S. Dennis, & W. Kintsch (Eds.), *Handbook of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pp. 439-460).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Free Press.
- Tur, B., Harstad, J., & Antonakis, J. (2022). Effect of charismatic signaling in social media settings: Evidence from TED and Twitter.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33(5), 101476.
- Twint (n.d.). In Twint project. *GitHub*. Retrieved August 12, 2022, from <https://github.com/twintproject/twint>
- Wang, Y., & Yang, Y. (2020). Dialogic communication on social media: How organizations use Twitter to build dialogic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ublic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4, 106183.
- Yang, J. (2003). Framing the NATO air strikes on Kosovo across countries: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S newspaper coverage. *Gazette*, 65(3), 231-249.
- Yang, Y., Hsu, J. H., Löfgren, K., & Cho, W. (2021). Cross-platform comparison of framed topics in Twitter and Weibo: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 to social media text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Mining*, 11(1), 75.
- Zhou, Y., & Moy, P. (2007). 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1), 79-98.

本文引用格式

- 江知萱、孫復威 (2023)。〈善與「俄」：俄烏戰爭中澤倫斯基推文言說框架與戰爭傳播策略分析〉，《傳播研究與實踐》，13 (2)：155-185。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6>
- Chiang, C. H., & Sun, F. W. (2023). The goodness and the wickedness: A study of discourse frame and wa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Zelensky's tweet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155-185.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6> [Text in Chinese]

The Goodness and the Wickedness: A Study of Discourse Frame and War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Zelenskyy's Tweet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CHIANG, Chih-Hsuan

Political Warfare Officer, Student Command, Army Academy

SUN, Fu-Wei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framing theory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themes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of the Ukrainian President Zelenskyy's public tweets on his official Twitter account dur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February 24th to November 13th, 2022, with a total of 447 tweets. After employing th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topic modeling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hematic framework of Zelenskyy's twee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in topics: 1. humanitarian persecution, 2. aid and boycott, and 3. solidarity with Ukraine. Upon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Zelenskyy emphasized war attribution and Ukrainian national/people's values in terms of good vs. evil induction, moral evaluation, and action plans. In addition, Zelenskyy expressed Ukrainian demands and interests while connecting his purpose and thematic framework with "slogans" to gain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social media, Russian-Ukrainian War, framing theory, narrative analysis,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fuweisun5@gmail.com

Received: 2022.11.02; Accepted: 2023.04.01

